

高教动态

中央财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2014 年第 18 期 (总第 228 期)

目 录

- 一、 国家科技计划管理将推行重大改革
- 二、 高校科研评价重大改革 北上广率先启动
- 三、 教育部公布近两年低就业率本科专业名单 北京 10 专业上榜
- 四、 为什么北大和哈佛不能教人创新
- 五、 商学院能不能“改”在高校前面

一、国家科技计划管理将推行重大改革

为更好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破除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科技计划“碎片化”和利益固化问题，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逐步建立起的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体系，将动一次优化布局的“大手术”。

由科技部、财政部共同起草的《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已经批准，即将发布实施。《方案》提出，政府不再直接管理具体项目，而是通过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宏观统筹，具体委托专业机构来管理。

解决科技资源“碎片化” 更加聚焦国家目标

科技部科研条件和财务司司长张晓原介绍，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科技计划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年来，科技计划的产出与国家发展的要求相比还远远不够，很多重要领域亟须真正具有标志性、带动性，能够解决制约发展“卡脖子”问题的重大科学技术突破。科技计划在体系布局、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总体绩效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政府各部门多头管理，重复投入，科技计划“碎片化”和科技项目取向聚焦不够两个方面。这些问题反映出科技宏观管理体制和政府部门的职能定位与科技创新及产业变革的趋势不相适应。

此项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强化顶层设计，打破条块分割，加强部门功能性分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以目标和绩效为导向的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体制。更加聚焦国家目标，更加符合科技创新规律，更加高效配置科技资源，更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最大限度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热情。

转变政府职能：五项原则优化财政科技计划体系

两部委在过去 4 个月对财政科技计划体系的“家底”进行了全面梳理，通过征求意见、借鉴国内外成熟做法，明确了优化财政科技计划体系的五项原则。

一是转变政府科技管理职能。政府各部门不再直接管理具体项目。二是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任务。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来优化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布局，确定主攻方向。三是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使科技创新更加主动地服务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四是明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重点支持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科技活动，以普惠性政策和引导性为主的方式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和成果转化。五是坚持公开透明和社会监督。加强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全过程的信息公开和痕迹管理，接受社会监督。营造遵循科学规律、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氛围。

政府部门不直接管具体项目了，那谁来管？根据《方案》，每年涉及上千亿元资金的近百项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大蛋糕”将在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上，依托专业机构管理项目。专业机构负责受理项目申请，组织项目评审立项、过程管理和验收。现有的、政府各部门条块分割的各类科技计划经费渠道将不再保留。

张晓原表示，政府从项目的具体管理和资金的具体分配中解脱出来后，将重点管宏观、管规划、管政策、管布局、管监督。此外，政府还有一个重要职责就是监管专业机构的履职尽责情况。

据了解，这次科技计划管理改革有确切的时间表：2014年就要启动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建设，在重点领域先行组织部分重点专项进行试点。2015至2016年，基本完成平台建设和各类科技计划的优化整合，实现科技计划安排和预算配置的统筹协调。2017年，经过3年的改革过渡期，全面按照优化整合后的五类科技计划运行，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改革。

新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公开统一

旨在破解九龙治水、条块分割，科技计划“碎片化”的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究竟是什么构架？

《方案》提出了6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一是建立科技计划管理联席会议制度，通过建立由科技部门牵头，财政、发改等相关部门参加的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联席会议，加强统筹规划。共同制定议事规则，负责审议科技发展战略规划、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的布局与设置、战略咨询与综合评审委员会的设立、专业机构的遴选择优等事项。

二是依托专业机构管理项目。组建一批专业化项目管理机构。专业机构负责受理项目申请，组织项目评审立项、过程管理和验收。

三是设立战略咨询和综合评审委员会。为联席会议的决策提供咨询、提供支撑。统一对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和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提供决策咨询，对项目评审提出指导意见，对特别重大的项目组织评审。

四是建立统一的评估和监管机制。从任何渠道下去的，中央财政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由科技部、财政部统一监管。监督和评估结果作为财政后续支持的重要依据，提高科技投入的绩效，多出成果和人才。

五是建立动态调整和终止机制。定期评估，非因科学研究正常原因实施效果不好的，或者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就要及时调整或终止。

六是完善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为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宏观统筹和信息公开提供技术支撑，并主动向社会公开信息，接受公众监督。

973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将优化整合

根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要求、政府科技管理职能的新定位和科

技创新呈现出的新态势新特征，《方案》提出新的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体系，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加强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支持人才和团队建设，增强我国源头创新能力。

二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产品和重大产业化目标，在设定时限内进行集成式协同攻关，解决国际科技竞争中“卡脖子”问题。

三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主要领域的重大、核心、关键科技的瓶颈问题。

四是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通过风险补偿、后补助、创投引导等方式，按照市场规律引导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资本化、产业化。

五是基地和人才专项。加强科研条件建设，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打造国家科技创新高地，支持创新人才和优秀团队的科研工作。

这五个方面的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均纳入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

“在五类计划中设立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就是《方案》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张晓原表示，当前，新科技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科学”到“技术”到“市场”的演进周期大为缩短。为此，将整合科技部管理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专项，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的产业技术与开发资金等，形成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设立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将瞄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主要领域的重大、核心、关键科技问题，以重点专项的方式，从基础前沿、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到应用示范进行全链条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使其中的基础前沿研发活动具有更明确的需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加速基础前沿最新成果对创新下游的渗透和引领。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年10月21日

二、高校科研评价重大改革 北上广率先启动

近日，高校科技评价改革试点单位上海市教委、北京市教委和广东省教育厅相继研究或出台政策，加快建立科学合理的高校科研分类评价体系，以质量和实际贡献为导向，通过多元化的评价机制，促进高校管理体制 reform 和教育综合改革。

上海市教委发布《关于推进上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分类评价的指导意见》，今后上海高校的科研能力评价，将不再仅依据发表论文章的数量来一刀切，而是将逐步建立科研人员的分类考核体系和科研成果的多元化评价体系，根据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进行评价。并将积极推进“同行评议”、“第三方评价”

和“国际评价”等评价方法，探索开放的、多方参与的科研评价措施，建立与国外接轨的评价制度。

根据北京市教委的统一部署，北京市属高校将迎来一轮科研评价机制改革，有望改变“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破解“没项目—不能晋职—被转岗”的难题，以科研质量为导向，防止片面地将学术项目、学术成果与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等挂钩，按照学术发展和科学研究的规律，逐步建立一套有效促进和形成优良学风的评价体系。

广东省教育厅以广东高校“创新强校工程”和“四重”（重点学科、重点人才、重点平台、重大科研项目）建设为契机，结合全省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加快推进高校科技评价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多次组织专家召开研讨会，正在制订整体方案，研究省内试点高校，探索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珠江学者”等基地、人才评估改革方案。

教育部将探索制定高校科技评价活动规程，系统梳理和规范科技评价的环节和程序，从组织程序上保证评价的质量和开放公正。同时，加强改革实践中的检查指导和跟踪调研，及时了解各地、各校试点进展情况，收集挖掘在改革实践中涌现的新思路、新办法、新举措，评估试点成效。

据介绍，自2013年年底以来，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科技评价改革的意见》，着力解决高校科技评价改革“世界观”的问题，回答“为什么做科研”、“科研为什么而做”的问题；教育部科技委发布了《高等学校科技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要点》，提供科技评价工作的“方法论”，回答“怎么评价”、“评价什么”的难题；教育部办公厅发出《关于开展高等学校科技评价改革试点的通知》，要求典型地区、典型高校针对明确问题，先行先试，加快探索实践经验，强化引领示范。教育部就高校科技评价改革工作3次发文，基本形成了完整的工作体系，要求地方和高校统一思想，抓紧抓好政策落实，同时在《中国教育报》、《中国高等教育》上推出专题，正确引导舆论，浓厚改革氛围，赢得普遍支持。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年10月21日

三、教育部公布近两年低就业率本科专业名单 北京10专业上榜

教育部日前公布近两年就业率较低的本科专业名单，表演、生物科学、旅游管理等15个专业上榜。北京有10个专业就业率低。

全国被亮“黄牌”的专业中，不少是前几年受追捧的时尚而高端的专业，如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动画、知识产权、电子商务。此外，当年部分新兴行业如食品卫生与营养学、生物科学也榜上有名。

这15个专业中，市场营销和公共事业管理在不少省份均榜上有名。比如，市场营销专业在山西、吉林、上海、浙江、湖南、广西等省市就业率低，

公共事业管理则出现在北京、上海、安徽、山东、广东、云南等省市的低就业率榜单上。

全国 3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低就业率本科专业名单中，北京有 10 个专业入围，包括音乐学、法学、新闻学等。

教育部整理发布该名单是为了加强对高校专业设置的宏观管理，引导高校主动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各地教育主管部门要对就业率较低的专业进行布点控制，综合应用规划、政策指导和资源配置等措施，促进高校优化专业结构。

教育部高教司提醒，各高校在申报专业时要参考全国、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就业率较低的本科专业名单，考虑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避免盲目布点、重复设置。

这些专业为何就业率低？

基础人才过剩，高端人才不足

法学是近年屡次上榜的就业率低的“黄牌”专业。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解廷民认为，目前全国有 600 多所高校开设法学专业，但传统的社会需求和就业渠道非常有限，造成法学基础人才过剩，而真正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法律人才储备却不足。

除法院和检察院、国家公务员单位、律师事务所等法学专业毕业生的传统就业单位，企事业单位目前成为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的增长点，到这些单位就业的比例越来越高。但是法学毕业生去这些单位就业也存在一定“瓶颈”。对于大部分中小型企事业单位来说，使用专门的法律人才属于高消费，不是他们急需的技术型人才；对于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事业单位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更高层次、成熟的法律人才，而初出茅庐的应届生很难符合要求。所以应届法学毕业生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法学专业与其他专业的区别还在于，“毕业证”不是“职业准入证”。本科生要想成为法官、检察官，必须在毕业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司法考试可以说是法学专业毕业生最重要的考试。在这项考试的通过率上，不同高校间的差距较大。在法学专业较强的高校，约 7 成在校生一次就能通过，而有的学校每届学生中可能仅有数人能通过，很多学生“被迫”转行。

学校培养与市场需求不匹配

此次北京地区就业率低的 10 个专业中，有 3 个和“经济”相关：国际经济与贸易、经济学、工商管理。

北京工商大学就业指导中心老师廖智伟认为，这 3 个专业几乎所有学校都有设置，导致没有特色、通用性强。普遍开设、普遍教学的代价，就是人才培养成效低、与市场需求脱轨，毕业生总量大，就业竞争激烈。即便是这样通用型的专业，在人才培养上也要结合市场需求。在北工商 2014 届毕业生

所涉及的 47 个专业中，上述 3 个专业的就业率都处于中上等水平，并非“垫底”专业，这和学校对学生的培养定位密不可分。

在教育部公布的全国就业率低的专业名单中，市场营销专业就业率尤为突出。一家商超集团的招聘负责人认为，这个专业虽然开办的学校多，但是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加上用人单位在聘用市场营销人才时不太看重专业，而注重实战经验，招聘需求和学校培养之间并不匹配，所以该专业成为学生就业的“重灾区”。

专业设置如何适应市场需求？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高校从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到学生就业存在一个较长周期，至少需要五六年。这就需要学校新设专业论证及评估既要符合自身的办学定位，又要对数年后社会人才需求形势具有前瞻和理性的研判，不能短视、盲目跟风。在新设专业人才培养上，学校要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满足社会需求，帮助他们了解新设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 and 定位，尽可能减少“求职难”与“招聘难”并存的现象。

有些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需要社会历练。从用人单位的角度看，有些单位更倾向于招聘上手快、适应能力强，或层次更高的学生。社会需求与学校的人才培养存在如何有效衔接的问题。

就业率专业榜单发布后，学校、学生、社会各方都应对其理性分析、客观看待，对今后一个时期就业市场做提前预判。谁能提前预判，谁就能赢得先机。

考生选专业该考虑什么？

选专业前先认识“职业”

解廷民表示，尽管法学专业多次登上就业“黄牌”榜，但每年仍有很多考生和家长选择法学专业。不少考生对法学的认识来自于影视剧，被电视里律师、法官“光鲜”的外表吸引，期待学完法学就能“鲤鱼跳龙门”。其实不然，这是个压力非常大的职业，每天要面对枯燥难懂的法条，就业时还要面对各类考试。如果前期不了解这个职业，考生就会承受不住压力，在就业岗位上待不到一年就辞职，或者直接抛弃老本行去做不相关的工作。

填报志愿不要只看学校“牌子”

北京科技大学招办相关老师认为，同一专业由于高校间师资力量、生源质量等方面的差异，就业也会有差异。选择专业时，考生要尽可能选择学校的优势学科，提前为毕业后的“出路”做打算，而不要只图学校的“牌子”。如果考生为了进“名牌”高校而选择自己不感兴趣或就业前景不好的专业，将来很有可能影响就业。

来源：《北京考试报》2014 年 10 月 22 日

四、为什么北大和哈佛不能教人创新

在现在的精英教育体系中，特别是像北大和哈佛这样最顶尖的学校，教授批判性思维是很重要的。所谓的批判性思维是指怎样客观地用逻辑来分析问题。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批判性思维并不等于创新思维。我们对创新有很多偏见和误解，最明显的一个，是很多人都认为创新最需要的是才能。如果我们认真研究最近创新的案例，就会发现创新其实是一条很痛苦、而且失败的可能性很大的路。成功地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通常都有很多性格各异的同伴，他们一边争吵一边坚持合作，最终取得了创新的成果。

创新需要高情商

在美国的《大西洋月刊》上，有人提出了一个叫创新伙伴（creative pairs）的观点。他指出，很多有名的作品都是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合作的成果。最有名的案例可能是“披头士”（The Beatles），他们最出名的歌的歌词都是保罗·麦卡特尼和约翰·列侬两个人合作写出的。他们两人的性格完全不同，约翰·列侬浪漫、自我，保罗·麦卡特尼有礼貌、有组织性并且有点功利。他们两个相互竞争，也经常发生矛盾，但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能相互启发，激发出彼此的优点。

在《引爆趋势》一书中，作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认为，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创新需要三种人的贡献。

第一种是提出想法的人，这种人很聪明，可是性格经常比较自闭和古怪。第二种是能把这些想法包装成社会需要的产品的人，他们需要了解市场的需求和经济的运转。第三种人能利用自己的关系网把产品在社会上推广开来。这样的人可能并不聪明也不会创新。但是他们性格开朗，擅长交朋友，还擅长在朋友圈子里推广自己支持的想法。

作者在书里也提到了，这三种人并不适合在一起合作，因为他们的性格相差太远。可是今天的事实证明，成功做出创新产品的团队，确实大多是由很多性格不同的人组成的。而且团队成功与否的关键，不是他们每个人多聪明或者创新能力多高，而是这个团队的成员是否能彼此配合。配合能力的高低，则取决于成员情商的高低。

情商，才是创新的关键。我们都知道创新的过程：有人提出问题，大家想解决的方案，执行看起来可行的方案，失败后大家一起检讨、自我反省、修改方案继续尝试。下定决心去创新的人必须足够自信，对自己想做的事有足够的热情。而且在创新的过程中，必须不断自我检讨、反省，接受别人的批评。只有成熟、敏感、自我认识高的人才能真正做到这些。

同时，创新需要足够的毅力。和别人合作的时候，也经常发生推诿、误解、争吵和利益矛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只有积累经验，跟不同的人接触，即使失败也不断做新的尝试——也就是去提高情商。而精英教育不能培养我

们的情商，甚至可以说会阻碍它。进入哈佛和北大这样的顶尖学校，学生实际上要学会的是怎么和别人竞争，比别人更优秀。而且，这些学校对成绩和结果的要求，会让学生不敢冒险做新的尝试。

创新是一种价值观，它与功利相矛盾

精英教育会告诉学生最后的成绩优秀才是最重要的，学生们相互竞争而不是合作的同时，也会导致他们的心态过于功利。在《驱动力》这本书中，作者丹尼尔·平克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种思考方式，第一种是功利的，让我们不择手段地追求短期利益。第二种是无私的，在使用这种思考方式的时候，我们很看重人际关系，会争取去理解、同情他人，而且会有意识地做对社会有好处的事情。每个人在不同的场合都会使用这两种思考方式。但是，这两种思考是不能同时存在的，而且使用功利思考总是比无私的思考更容易。

以色列有一个幼儿园因为家长来接孩子时经常迟到而困扰，于是有一个经济学家帮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罚迟到的家长的款。我们可能觉得为了逃避罚款，迟到的家长数量会减少，可是实际上在执行罚款制度之后，更多的家长开始迟到了。这是因为，在执行罚款制度之前，家长觉得他们和老师是朋友，迟到时会感到后悔和歉疚。而执行罚款体系之后，家长感到老师是在给他们服务，即使迟到也不用感到不好意思，因为他们已经用钱弥补了这个问题。

这就是说，一旦人用功利心态面对某件事之后，就很难再让功利心态消失。现在的精英教育和我们的社会结构，其实都在鼓励我们使用第一种功利的思考方式，但是科学研究证明，创新能力和情商都是由第二种思维方式产生的。因为创新本身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重点或结果。在这个过程中，要带着好奇、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跟很多不同的人接触。只有从和自己不同的人身上学习，珍惜他们的才能，并和他们相互帮助，才能最大地激发创新的潜力。可是当我们带着功利心态的时候，就很容易相互怀疑和排斥，让交流合作变得非常困难。

创新不一定能带来成功，但是能够让人快乐

精英教育一个很大的错误是对学生强调，如果进入了北大或者哈佛这样的顶尖学校，之后一定要在社会上变得成功，最好是要出名、赚很多钱，不然就是对不起母校。同时学校也告诉学生，如果想要成功必须学会创新。其实精英教育体系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两件事是矛盾的。

精英教育体系最失败的一点，是鼓励相互竞争，学生们太相信成功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不知道其实生活并不应该是一架通向成功的梯子。生活不是这样清晰而直接的，它更像是一片夜里的森林，为了走出森林我们只能一起合作。我们从合作之中感到生活的意义。很多案例都说明成功不能给人带来快乐，而创新可以。创新不一定能带来成功，但可以让我们感到快乐和满

足。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4年10月9日

五、商学院能不能“改”在高校前面

在国家改革迈入深水区的今天，国内第一批恢复办学的管理学科也走到了新的历史起点。

这个秋天，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庆祝了创立30周年。老师们为系列纪念活动作了一个颇有深意的概括：“三十而立，见证中国。”从1984年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天津大学恢复设立改革开放后的首批4家管理、经济学院算起，国内的管理学科已经“三十而立”。

30周年纪念活动中，天津大学邀来一些具有声望的国内外同行，研讨“商学院的使命与社会担当”。毕业于天大的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李荣融感慨，1984年是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年，而商学院是伴随着这场改革一起成长的。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9月下旬发布的《管理蓝皮书：中国管理发展报告（2014）》指出，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至今，中国的管理学日趋成熟，难以找到另一个学科有如此迅速的发展。

商学院中，最广为人知的教育项目是工商管理硕士（MBA），这是国内批准设立的第一个专业硕士学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在该院30周年庆祝活动中这样概括：中国的MBA和EMBA教育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联系最紧密、受益最直接的研究生教育项目。在英国《金融时报》EMBA排行榜上，2013年全球前10名中就有3个是中国大陆的项目，这种国际认可的程度，在国内高等教育的各学科、各项目中都极为突出。

过去30年里，管理学无疑是广受欢迎的显学。9月16日，在欧美同学会年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论及创新人才培养时曾感慨，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这位生物学家最想培养的学生都表示想去金融公司。

据86岁的天津大学教授印邦炎回忆，管理专业改革开放后首次招生就是“热门”专业。当年天大招收第一届管理学本科生时面临很多困难，唯有生源并不犯愁，招生数超出了计划数。

不过，在天大“商学院的使命与社会担当”论坛上，谈论更多的是反思与困惑。

81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原主任郭重庆在天津大学说，这30年在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对中国来说则非同小可。很难用一个词汇来概括大家取得的成就，这是一个“烈火中重生”的过程。但是今天，在新技术冲击、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的管理学教育能够适应吗？

郭重庆问他的同行：“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的时候，我们准备好了没有？”他近来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互联网将重新定义管理”。

他说，大数据是接近对人类真实世界的表述，而过去管理学的那些模型缺乏实证。新的技术革命将开启管理科学研究的新的范式，管理学界应该抓住这个时机。但是目前管理学的同行评议体系，日益形成了一个论文导向的学术价值偏好，沉溺于模型但又缺乏数据支持，偏离实践、实证和实验，结果缺乏验证，造成“工具理性猖獗、价值理性迷失”的自娱自乐的困境。

在他看来，评价体系“把我们逼到了不能再逼的程度。”

清华经管学院原院长赵纯均也指出，中国的管理学教育目前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脱离实际的倾向，这和追求“研究型管理学院”很有关系。他对此并不赞成。

他说，很多大学确定了研究型大学的建设目标，与之相适应，管理学院也要建成“研究型管理学院”，但世界上哪个商学院是“研究型的”？他作为富布莱特学者曾在美国研究一年，找不到所谓的“研究型商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有几分像“研究型商学院”，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也不好简单地用这个词来概括。

赵纯均说，十多年前，对于北美的商学院脱离实际的倾向，在学术界和实务界都有强烈批评和相当长时间的讨论。耶鲁、斯坦福等校商学院都进行了步子比较大的改革。如果不关注这个动向，恐怕就不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管理学院在中国要站得住脚，必须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培养的人也必须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其中培养人是第一位的。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原院长王方华说，人们常说“三十而立”，但就像年轻人而立之年买房、结婚、职业发展都遇到困惑一样，中国的商学院也有“三十而立”的困惑。

据王方华介绍，他们最近在52所国内称得上最好的学校中做了一项调查，问大家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的精力怎么分配，结论是老师们大约75%的精力放在了科学研究，要评职称、写论文，不做研究就没办法生存。20%用在人才培养，5%用到了社会服务。“这样，我们大学叫研究院得了。”

说到教师评价体系，赵纯均指出，每个学校、每个学院的领导们都应扪心自问，自己是一怎么样去管理教师的。“说一句难听一点的话，就是像人民公社时代的生产队一样搞。”领导们喜欢把许多考核指标加权平均以后，与教师的收入联系起来，完成多少就给多少钱，“你说教师的行为能够像一个知识分子的行为吗？这个东西已经搞了十几年了，最初是少数学校。我观察了这个现象，我觉得人力资源专家真应该研究一下，不然这支队伍真的毁掉了。”

王方华的另一个困惑是，各校提出要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商学院，引进了大量的海归学者，但是有的学校不再接受具有中国博士学位的人任教。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很多三流大学学生经过艰苦努力考上了一流

大学，最好的出路是到二流大学去任教。

赵纯均担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期间曾做过一件轰动的事情。2002年，清华经管学院一次引进了28个当时很轰动的“百万年薪教授”。但他看不惯现在有的学校为了争一流，定下的“只要洋博士，不要土鳖”的规矩。他称之为“洋教条”。

南京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赵曙明感慨，现在很多事情都是跟风，一流大学也好，一些较小的学校也好，考核老师都要求在一流刊物发表论文，招聘老师一定要本科出身于“211工程”、“985工程”高校，实际上是对人才的一种歧视。

曾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的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开玩笑说，自己本科毕业于陕西机械学院，按照今天这个标准，不可能进入西安交大。

席酉民认为，这是资源配置体系和评价体系所致。好的大学都陷在已有体制内不能自拔。国家通过各种项目把资源分到学校，而校长天天要去算数。他建议从立法上而不只是从各校制定的大学章程上对办学进行规范和保障。在资源配置上，杜绝“跑部钱进”现象。

他同时认为，很多校长、书记经常以体制为由，给自己不作为找借口。在现有制度下，他们还是有能力能做很多事情的。

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也认为，一个学校能不能真正办好，学校自己还是能够做很多事情的。天大目前就在几个学科做试点，希望创造一个自由度较高、自主权较大的相对宽松的环境，做校内能够做的事情。他开玩笑说：“这里面也有院长的事情，不要老说校长。”

听起来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天大“商学院的使命与社会担当”论坛上，这些嘉宾们谈论的多数话题都与商学院无关，而是直接指向了大学：行政化、资源配置、师资的聘任与考核……大学遇到的这些困惑，正处于而立之年的商学院一个也没落下。

王方华说，国家在改革发展，现在只去埋怨于事无补。在资源配置中，商学院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有自己的办学收入，上级投入的部分只占小部分，因此商学院有力量做很多事情。“商学院应该在大学改革中间走在前面……我们的改革要为大学的改革提供经验。”

“我觉得，中国的管理科学教育已经进入了踢足球的下半场，客观条件完全变了，你不去变的话就不可能肩负起使命与担当——我总觉得我们准备不够。”郭重庆院士一再指出。

钱颖一指出，目前中国对外投资达到每年700亿美元、累计5,000亿美元的规模。这些对管理教育的全球化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的管理教育不仅要在本土与全球商学院竞争，还要培养出能够走向世界的管理者 and 企业家。他说：“我们有高质量的学生，我们处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我们要抓住机遇大力度地推动改革，敢于做试验田，敢于走在前面。”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4年9月26日